

辽宁大学研究生论文选

(八二届硕士论文)



辽宁大学科研处编

一九八二年十月

目 录

论法国1793—1794年间的限介问题·····	李永昌 (1)
十八世纪末期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发动的一场重大政治斗争·····	刘书林 (38)
新模范军与克伦威尔·····	宋 华 (67)
十九世纪英国选举改革的演变·····	焦玫瑰 (88)
张学良的抗日爱国思想和活动·····	王维远 (109)
论东北解放区大工业的经营管理·····	徐建东 (137)
试论日本早期封建制的几个特点·····	刘 毅 (157)
岩仓使团美欧之行在日本近代发展中的作用·····	孙 承 (184)
卡莱茨基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述评·····	郑 品 (211)
评一九六五年以来苏联信贷制度的改革·····	程 伟 (253)
用TB法计算AlSb、ZnSe、CdTe、Sn的电子能带·····	范钦梁 (281)
用TB方法计算BN、AlSb、ZnSe、ZnTe、CdTe的能带·····	郭志权 (305)
关于应用刚堡——巴赫曼反应合成5CB液晶改进方法的研究·····	孔 杰 (334)
辽宁产东亚钳蝎 (<i>Buthus martensii</i> Karshi) 毒两种毒素的纯化 及其部份性质的研究·····	周新华 (350)
浙江产蝮蛇毒透明质酸酶的纯化及部分性质·····	王积堂 (343)

论法国1793—1794年间的限价问题

研究生：李永昌

指导教师：王荣堂教授

在轰轰烈烈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提出并实行了粮食和其它商品的限价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和实施经历了斐扬派统治、吉伦特派统治、雅各宾专政和热月党统治四个重要历史阶段。限价问题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这一重要历史现象对于了解雅各宾专政的经济政策，雅各宾专政的性质及其失败原因，理解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平民方式”，从而深刻认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某些特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想就“限价”问题的提出、内容、各阶级和各政治派别围绕限价问题的斗争以及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进行分析，以期进行一次全面的探讨，并尝试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作出科学的评价。

一、限价问题的社会历史根源

限价的要求是谁最先提出来的？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其说不一。^{〔1〕}然而限价要求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党派的凭空捏造或臆想，而只能是以某种社会要求作背景，从这个意义说商品限价是十八世纪末法国社会特定的经济条件下提出来的。一种特定的社会要求。事实上，法国人民群众的限价要求是由来已久的。早在1775年爆发的群众骚动“面粉战争”中，就已经提出反对粮价上涨和平抑物价的要求。就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夕，1789年春天在普罗温斯的四十多个农村和城镇都发生了群众骚动，要求取消面包税，抢劫税官住宅，并为所有的粮食都规定了一个最高价格。^{〔2〕}因此，限价要求有极为深刻的经济根源、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首先看限价要求的经济根源。革命前的法国封建王朝经历着致命的财政危机。从路易十四以后，法国财政就已空虚，财政危机一天天加深，仅仅供养宫廷的高级贵族、官吏和僧侣（共一万五千人）就要每年耗费四千万利维尔（约合一亿法郎），占全国收入的十分之一，再加上支援北美独立战争的开支大约二十亿利维尔，到1789年法国的国债总额达到45亿利维尔。封建统治阶级通过举债、卖官、增税等手段把这些沉重的负担都转嫁到第三等级，特别是广大劳动群众身上。在1726—1741年间物价上涨了65%，而工资仅增加22%，劳动群众的购买力已经降到了最低限度。^{〔3〕}如果再以这期间的物价指数为100，那么1771—1789年间平均上涨45%，从1785—1789年间平均上涨65%。^{〔4〕}由于1788—1789年的饥荒，到1789年巴黎的面包价格（四磅一个的面包）涨到14.5苏。

一个工资收入者每天花在面包上的费用占全部收入的50%。到1789年6月政府不得不每天拨出18,000利维尔用来维持已到危险点的面包价格使之不再继续上涨,总之,面粉和面包价格的急剧上涨是十八世纪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5〕}在这种形势下,广大劳动群众反对粮价上涨的骚动接连不断,到革命前夕,马赛、土伦、奥尔良等许多城市群众袭击官吏住宅,抢劫谷物,平抑物价的事情层出不穷。腐朽的波旁王朝企图挽救这种局面,下令禁止粮食出口,奖励粮食进口,并向国外订购达十四亿公担的大米、黑麦、大麦和面粉,还拨款建造手摇磨,甚至昏庸的路易十六也预言为了保证供应,将用小麦和黑麦的混合面粉为富人和穷人烤制同一质量的面包,这种面包也许会出现国王的餐桌上。^{〔6〕}但是波旁王朝是无济于事解决致它于死地的财政危机的。作为财政总监把封建的法国和革命的法国联系起来的内克在马拉和德木兰的嘲笑攻击声中去职,凄惨地离开了巴黎(1790年9月8日),宣告了法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经济政策的最终破产。

1789年以后,革命的资产阶级继承了法兰西,也继承了它的累累国债和连绵不断的社会骚动。“这是革命必须立即解脱的重负,它使革命处于危险境地,推卸不掉的债务!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字眼!它就像敲响了葬钟,就像一个纠缠不休的无常鬼使那些甚至最可信赖的人们的一生黯然失色”。^{〔7〕}

革命后的主要食品价格除了1790—1791年稍有下降外,从1791年9月开始又继续上涨。1791年8月巴黎的面粉已告紧张,9月面包(四磅重)价格为12苏,面粉从7月每袋38利维尔,到9月涨到54利维尔,到1793年6月主要食品价格比1790年均大幅度增长;面粉增长9%,酒增长60%,牛肉增长77%,奶油增长90%,鸡蛋增长31%,大米增长121%,橄榄油增长80%,糖增长300%,咖啡增长135%,牛油蜡烛增长了167%。同时期工人的工资虽有增加但还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尤其在各地物价上涨更为严重,如在阿利埃郡每四磅一个的面包涨到20苏,到1793年9月巴黎主要食品价格又有较大的增加,如酒增加25%,牛肉增加85%,鸡蛋增加84%,奶油增加33%,糖增加10%,肥皂增加175%,牛油蜡烛增加10%。^{〔8〕}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和饥馑由于物价上涨、投机商人的囤积而加剧。1793年粮食丰收,但是粮荒依然不能解决,尤其是下层群众需要的次等谷物尚短缺2,700万公担以上。^{〔9〕}由于殖民地的起义使法国的食糖供应几乎断绝,但是在巴黎、哈佛尔、波尔多、卢昂和阿尔芒等地的货栈里的大量食糖储备都成为其所有者投机牟取暴利的资本,他们趁机制造饥馑。加上革命以后法国素享盛名的珠宝首饰等奢侈品生产全部停止,尤其是巴黎大批的首饰工人陷于失业之中。

随着物价的上涨,深受涨价之害的广大下层群众要求限价的运动也日趋高涨。1792年1月20日巴黎圣马索区和圣丹尼郊区的工人和小作坊主冲击店铺要求降低商品价格;2月诺伊昂地区的农民手持长矛、斧头和火枪阻止瓦兹河上运粮船的运行,并把粮食分掉或强行限价拍卖,立法议会闻讯立即派出四名议员前往“安抚”和“规劝”,但农民们依然拒绝交出所扣粮食;2月27日在波城也发生群众迫使地方政府实行生活必需品限价的事。3月3日埃丹培市长西摩诺下令枪杀要求限价的群众,被愤怒的群众击毙,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国对粮食问题的注意。1792年11月底在厄尔——罗亚尔都发生了粮食骚动,国民

公会立即派议员前去，并授权可以武装镇压。但是他们被数千名武装群众包围，人们高呼“这些人是骗子、贵族，应该把他们吊起来！”他们无奈只好同意按1790年价格签署限价的命令。他们向国民公会报告说，群众交给他们一只笔和一把斧子，如果不答应限价就必须用斧头砍掉自己的手。国民公会“公开谴责”他们的软弱。^[10]

1793年2月巴黎爆发了遍及全市的骚动：冲击店铺。群众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妇女，她们冲入食品杂货店强行限价。当时的《巴黎革命》报写到：“妇女们走在最前头对店主说到：‘你们有糖、咖啡、肥皂吗？我们警告你们，如果你们珍视你们的财产，你们就必须按照指给你们的价格把这些商品卖给我们’……有的妇女腰间挎着手枪，……她们强行按每磅20——25苏的价格发放糖，沙糖每磅8和10苏，肥皂和蜡烛每磅12苏……不少人没有打开自己的钱包就把东西拿走了，……在很多情况下商品被陆续抢走，但是这些商品的用处并不为人所知：按30苏一磅的价格买的肉桂和香荚兰，实际价格值120利维尔，按20苏买的染料靛蓝却值30利维尔……”据统计在巴黎的32个区这类事件都有发生。^[11]由于巴黎街头时有抢劫粮食、面粉和肥皂的事件发生，国民公会甚至下令宪兵在街上巡逻。

1792年初立法议会收到各地要求实行限价的请愿书甚多。1月23日巴黎格拉维叶区的请愿书要求立即采取反投机措施，指出商人们控制商品并按投机价格出买是违反“人权宣言”的，因此必须制订公正的法律制止商人的贪欲，“这些投机商们如果有可能他们甚至准备把爱国者的骨头卖给国外的亡命者以发一笔横财”。^[12]11月19日塞纳—瓦兹省的请愿书说在共和国中，“从事粮食买卖”的是“为数不多的资本家”，他们控制了大多数贫民的命运，粮食供应权应由中央政府掌握，应该使粮食价格和劳动日价格保持一种合理的比例。1793年2月12日巴黎四十八区致国民公会的请愿书写到：“为了使人民幸福就必须使人民有粮食，在没有粮食的地方，不会有法律，不会有自由，也不会有共和国；”指出人民的骚动是由粮价上涨引起的，还质问那些“绝对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们”“对你们来说，不能制定一个好的粮食法令，就意味着在推翻暴政以后不能管理国家”。请愿书最后要求对贪污的官吏处以十年苦役，高价出卖谷物的土地所有者和商人初犯处以六年苦役，再犯处以死刑。要求全共和国生产同一规格的面包。^[13]

到1793年初，就连国民公会派往地方的议员和一些地方政府也认为必须采取革命手段解决粮食和物价问题：尤拉省曾经下令征集粮食；科洛·得霸在尼维尔市为取得粮食而开动了绞首机；议员冉蓬·圣·安德烈3月6日写信给国民公会要求采取重大的拯救措施：“社会事业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只有最迅速、最果断的手段才能拯救它。到处都可以感到革命造成的疲惫，富人们憎恶革命，穷人需要粮食，有人告诉他们，这是我们的罪过”。^[14]这时限价的要求已经成了普通的社会呼声。

其次关于限价要求的阶级根源。限价要求首先反映了深受涨价之害的农村雇农，日工特别是城市大量手工业者、手工业工人、小业主、和城市贫民的经济要求。当时的法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在全国2,500万人口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除了极少一部分大农场主和富农外，绝大部分是自由农民，其中大部分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在农村中没有土地或有极少量土地的日工和雇农也占一定的数量，有的地方达到

农民总数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⑤这些人所需要的粮食大部分或全部向富裕农民购买，因此他们也深受粮食涨价之苦，他们是农村中要求限价的主要力量。

在总人口中城市人口大约占195万人，全国只有两个城市人口超过十万人，其中巴黎60万人，里昂13万5千人，其余市镇大都在2—8万人之间。其中巴黎工人只有7万5千人左右，而且分布很不集中，平均每个工场不过十几个工人，较大的工场也不过200—300人。这时期法国的工业生产主要方式仍然是分散的工场手工业，工人以家庭劳动为主，在家里接受订货，用自己的工具生产，有的则是完全的家庭作坊，全家成员劳动，产品直接投向市场。所以这时的法国工人阶级尚未从小资产阶级阶层中分化出来，尚未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巴黎人口中除大约15,000个教士和贵族之外，绝大部分是小业主、手工业者、作坊主、小店主、帮工、贫民和流浪汉。由于粮食供应不足，物价上涨，巴黎下层群众的境遇甚是凄惨，巴黎街头饥民和乞丐充斥，有很多是来自外地的灾区农民靠行乞度日。革命开始以后，巴黎的贫民人数仍然不见减少，据统计从1793年9月到1794年9月急需救济的无产者人数仍有七万之众，几乎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需要救济。^{〔16〕}

这样，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由于小资产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日益恶化，就出现了以城市下层群众为主体的法国无套裤汉思潮。^{〔17〕}尽管这个阶层的成分复杂，但是饥饿、破产和贫困把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他们对资产阶级、商人的投机活动、囤积垄断、哄抬物价深恶痛绝，要求限制大资产者、贵族、投机商的贪欲，要求限制物价，使物价和工资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他们的理想是实现平均主义的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1793年9月2日巴丹花园区（即后来的无套裤汉区）致国民公会的请愿书典型地反映了无套裤汉的社会要求。其中要求国民公会下令从所有军事和民事职务中清洗前贵族、前议员、银行家和神甫。“要求一切生活必需品按所谓旧时代即从1789年到1790年的价格固定限价，以适应价格变化的幅度”；还要求规定原材料的价格，对“工业利润、劳动消耗和商业利润都应由法律加以限制，可以允许工业家、农民、商人不仅保证他们有保障其生存所必需的部分，还可以高于它”；还要求“规定财产的最高限额”，“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耕犁的一定数目所需要的土地”，“一个公民只能拥有一个工场，一个店铺”；“一切以自己的名义拥有商品和土地的人都被认为是财产所有者”。请愿书认为这样就可以使法国“恢复富足和安宁，逐步走向消除财产的过分不平等和相应地增加财产所有者的数目”。^{〔18〕}可见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尤其是城市无套裤汉是限价要求的阶级基础。

第三，在法国革命中涌现一些代表无套裤汉利益的思想家，他们试图赋予无套裤汉的限价要求以理论根据。

贫民思想家兰治^{〔19〕}1792年6月在里昂出版两本小册子，论述工业、贸易和粮食问题。提出“确保丰衣足食和确定粮价的简单易行的方法”，他设想了一种类似合作制的集中分配粮食的乌托邦计划，他主张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

彼埃尔·多利维尔，是一个乡村的穷牧师，1789年就真诚地参加了革命。他曾经就西摩诺事件致书立法议会，他以埃丹培居民的名义反对巴黎悼念西摩诺。他试图从理

论上论证贫民的限价要求，他认为不能允许食品的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必须规定使贫民不受涨价之害的商品价格。最主要的是他试图对通常资产阶级的财产权观念作新的解释，他首先怀疑所谓“土地所有权”的说法。他认为“一切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权都来自法律，而法律是国家即国家政权制定的，甚至可以假定，国家可以正确地规定土地占有方式（即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难道国家（国家政权）就完全放弃其对土地产品的权利吗？难道国家权力可以制定一种与自己的本质完全相反的法律，根据这种法律贫民们不能享受土地产品用来满足自己的急需”。〔20〕

无套裤汉思想家肖梅特也对财产权作了新的解释。1792年11月16日他说道“土地财产，谷物和一切属于粮食的东西都仅仅是一种有条件的财产：它们的真正所有者是它的消费者，它们属于整个共和国，而它们的占有者只不过是保管者。如果出于自己的贪婪而把大自然恩赐给大家的东西控制在自己的谷包里，就成为罪犯。是认真分清各种类型的财产的时候了”。〔21〕肖梅特还认为革命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只是贫民的地位没有改变，革命也赐给了他们自由和平等，但要自由地生活，必须首先有生活的可能。如果在工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之间没有合理的比例，贫民就不可能生存”。〔22〕1792年11月19日塞纳·瓦兹郡代表团来到国民公会，发言人古戎指出：“粮食的自由贸易和我们共和国的生存是不相容的”，他抨击富人靠提高粮价发财致富，应该使“粮食价格和劳动日价格之间有一个正确的比例，法律应该维持这种平衡，无限制的自由贸易是维持这种平衡的障碍”。他要求取消大农庄，限制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数目，“使每个所有者只能亲自经营一个农场，多余的必须交出去”。〔23〕1793年4月18日巴黎郡总检查长留里埃在致国民公会的请愿书中指出“财产权并不能成为使自己的同胞挨饿的权力，土地产物如空气一样是属于全人类的……”他要求“在全国规定粮食的最高价格”，“取缔粮食交易”，“禁止土地所有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一切中间活动”，“每年秋收之后进行粮食全面登记”。〔24〕

代表城市最下层贫民利益的“忿激派”的领袖扎克·鲁和华尔勒态度更为激进。前者是出席巴黎公社的格拉维叶区的代表，他是1793年2月12日巴黎四十八区请愿书的起草人。鲁坚决要求用恐怖措施惩办投机商人和那些使指券失去信用的人，要求严格管理粮食贸易，禁止出口一切生活必需品，粮食必需在公开市场上出卖，在各大城市建立公共商店。华尔勒是一个人民演说家，巴黎街头示威的组织者。他在小册子《社会财产方面人权的庄严声明》中说穷人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自由和安全以及他们本身代表了一种最重要的幸福。保卫自己不受富人压迫，借助正义的手段消除丑恶的财富分配的不平均现象，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力。通过掠夺、投机活动、垄断和收购得到的财产应该成为公共财产。〔25〕以鲁和华尔勒为代表的“忿激派”还要求把富人住宅变成仓库，把粮食制品变成人民的财产，用死刑惩办投机商，组织由无套裤汉组成的革命军。〔26〕1793年6月25日扎克·鲁在国民公会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演说，攻击1793年宪法没有禁止投机活动的条文，他质问“难道骗子们的财产竟比普通人的生命更神圣些吗？”〔27〕

综上所述，法国无套裤汉以限价为中心的经济要求的实质在于：第一，没有提出消

灭私有财产，只是企图反对大私有者，保护小私有者，使无财产群众变成“财产所有者”，消灭财产的极端不平均现象；第二，无套裤汉思潮的实质是平均主义，力图在保护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实现其“一小块土地，一个作坊，一个店铺”的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第三，原则上并不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只是主张限制或取缔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自由贸易；第四，他们的要求只限于分配领域，即通过国家立法干预经济生活，通过立法（如限价）合理调节供求关系，实现生活必需品的合理分配，因此他们的要求并未超出资产阶级经济结构的范围，并未触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第五，限价要求的主要理论根据是生存权，在他们看来财产权和贸易自由权首先应该服从生存权，他们据此对资产阶级的财产权观念作了新的解释。在他们看来这种财产权只是一种相对的，有条件的，受到生存权制约的权力，所以生存权是无套裤汉争取限价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

二、各政治派别对限价问题的态度和围绕限价问题的斗争

1789年以后，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像幽灵一样伴随着整个革命的进程，“大革命的最大困难莫过于要在可怕的财政状况中寻出路”。〔28〕为此，各个阶级、政党和派别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都试图按照自己的要求解决这个关系到革命生死存亡的问题。

大资产阶级斐扬派解决财政问题的最重要政策就是通货膨胀，发行指券。1789年12月2日由奥顿王教塔列朗提议国民议会颁布了没收教产的法令，宣布“全部教会财产由国家支配”，其他如宗教仪式的开支、牧师的维持、贫民的救济“由各郡依其指令管理”。〔29〕然后决定以价值总额为40亿利维尔的教产为担保发行指券，议会于1789年12月19日和21日发布两条法令作了明确规定。1790年4月17日又颁布强制发行指券法令，其中第三条规定“根据1789年12月19日和21日的法令创立、经国王批准发行的指券是在整个王国范围内所有人中间流通的货币，并将为所有国营和私营银行作为王国货币接受”。这项法令使指券具有和纸币同等的作用并强制在国内流通。〔30〕

当然发行指券并不是没有斗争的。当时一本署名“人民之友”的题为《指券对粮食价格的影响》的小册子认为，过量发行指券将造成物价上涨，并指责用教产作担保的作法，认为这不过是“欺骗人民”。还预言“粮食作为主要的和最有用的商品将要按高一倍的价格出售”。巴那夫在议会宣读了这本小册子之后，有人问“作者是谁”？下面应声答道：“我”！此人就是杜谤·得·内木尔。接着当时拥有财政全权的米拉波对这个人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驳斥说有人“认为指券无益，因为它不能造出硬币，这就等于说在灾荒之年不该种稻子，因为它不能长出黑麦一样”。他断言“这一措施是必须采取的，对我们来说，这比其他任何办法都更符合我们的需要……难道有谁能立即弄清楚会出现或者不会出现的困难？白昼不仅可以带来阴影，它同样也带来了光明：我们是在为纠正错误而工作，形势还没有使我们措手不及而且全体公民又如此热切地关注着我们的

措施……”^{〔31〕}反对者似乎也无计可施。此后指券多次发行，到1794年5月15日止流通的指券已达5,534,160,385利维尔，大大超过作为担保的教产价值，随之而来的是物价持续上涨、投机活动盛行、指券急剧贬值，金银和硬币从市场消失并成为走私和投机活动的对象，下层群众生活日趋恶化。不管米拉波怎样能说会道，历史已经表明大资产阶级以发行指券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对无套裤汉来说是贻祸无穷的。

吉仑特派对限价问题的态度。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仑特派在革命后，特别是1792年8月10日革命以后，一方面害怕封建制度的复辟而断送革命带给资产阶级的益处，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广大下层群众把革命推进一步，会触及他们的财产权。他们认为已经实现了两次革命：一次推翻了专制制度，另一次推翻了王权，他们认为8月10日以后开始了第三次革命，这次革命的任务将是“消灭无政府状态”。吉仑特派的杰出演说家维尼奥说过：“我以为可以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消灭财产权或制定土地法，另一种是把我们拉回专制制度，我断然反对这两种革命。”^{〔32〕}吉仑特派领导人布里索1792年10月在《致法兰西全体爱国者》一文中激烈攻击所谓“秩序破坏者”，攻击“平均财富”和“平均商品价格”的人，他指出“谁想使在劳动营中工作的工人和立法者的收入一样多，谁就是秩序破坏者”。^{〔33〕}他甚至断然主张用“铁的手腕镇压一切想要平均财产，平均才能和知识的人。”他们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绝对的贸易自由，即通过价值规律，通过供求关系自行调节商品价格。吉仑特派经济政策的决策人物是罗兰，他在1792年11月18日致国民公会和巴黎公社的信中表示反对政府干预商业、工业和任何经济事务，他预言如果人为地降低食品价格，限制商人出售商品的时间和地点将会引起全面混乱。他认为巴黎的情况要比其他城市好得多，这里的粮价也更便宜得多，巴黎人的任务是“消除那些背信的鼓动家们给人民造成的担心”，如果政府干涉粮食贸易，粮食将会从首都消失，农民和粮食所有者不敢在市场上出现，怕受到打击，因此将最终“断送首都和国民公会”，^{〔34〕}我们下面将看到罗兰的可怕的预言如何变成了现实，这与其说是这位老人不幸“猜中”了，还不如说吉仑特派的领袖们比无套裤汉的领袖们更了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需要。

吉仑特派继续发行指券的政策。根据坎蓬提议，1792年10月17日议会通过了发行新的指券的提案使指券流通额达到24亿，而且以后继续发行，指券的进一步贬值又加剧了物价的上涨。吉仑特派认为并不存在粮食危机，这只是巴黎公社出于其反对国民公会的需要杜撰出来的。他们主张镇压人民群众的粮食骚动，认为这都是王党和拒绝宣誓的牧师组织的，在1792年11月厄尔·罗亚尔郡骚动时他们就主张实行武装镇压。

吉仑特派对法国面临的经济困难估计不足，他们只是出于本阶级的利益，执拗地坚持对资产阶级有利的解决办法。他们对无套裤汉视如仇敌，但是对这个阶层的力量却毫无认识。从1792年秋天开始，法国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广大下层群众的限价要求日益强烈，粮食骚动连绵不断，群众不接受吉仑特派的经济政策。1793年1月22日罗兰辞职，标志着无套裤汉反对吉仑特派的经济政策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并为1793年5月4日吉仑特派国民公会被迫实行的第一次限价打下了基础。

罗伯斯庇尔代表的山岳党人对限价问题的态度。很多学者几乎都认为罗伯斯庇尔代

表的山岳党人是在下层人民群众的压迫下，特别是在“忿激派”和埃贝尔派的压迫下实行限价政策的。法国学者索布尔和英国学者卢德从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之间的“阶级斗争”的角度去分析限价政策，索布尔认为“作为经济自由化的支持者，公安委员会的活动家们只是并非情愿地走上了统制经济的道路”，只是企图“维持在企业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某种平衡”，只是出于“战争的需要”，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临时措施”。〔35〕苏联学者卢金也认为罗伯斯庇尔是被迫同意无套裤汉的限价要求；〔36〕列甫年柯夫认为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政权只是“从其资产阶级利益”出发为保障城乡有产者得到更多的劳动力的需要。〔37〕还有不少苏联学者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38〕。苏联最著名的法国史学者曼弗列德在他主笔的《世界通史》第六卷第一章中指出雅各宾派开始反对实行限价，但当他一旦认识到实行这种政策的必要性时，他们就积极地行动起来坚决实行限价政策。〔39〕在他逝世之后出版的《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三个肖像》一书中认为罗伯斯庇尔并不把实行限价仅仅看作临时措施，而是把这一政策和实现其“永恒正义的王国”联系在一起。〔40〕

那么，这些在雅各宾专政时代真正把广大下层群众的限价要求变成社会立法并借助恐怖行动去实施这些法令的山岳党人起初为什么没有提出限价要求呢？这似乎是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从1792年底和1793年初山岳党领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讲演来分析似乎有如下两个原因：第一，山岳党人对造成法国所面临的经济困难的原因和严重性的认识尚不一致。从罗伯斯庇尔1792年12月到1793年初的多次讲话中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1792年12月7日他曾说到：“首先没有必要为粮食供应问题而提心吊胆，饥饿的原因并非粮食缺乏，因为法兰西的土地会生产出超过人民的饮食需要多得多的粮食……”因此他认为国民公会应该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拯救祖国，即如何消除在王权的废墟上出现的新的暴政。〔41〕而几乎在同时（11月29日）圣茹斯特在国民公会指出粮食危机的原因是过量地发行指券，由于农民不愿意用粮食兑换指券。他把粮食问题的严重性看得比罗伯斯庇尔严重得多，他说，如果你希望建立一个共和国，你就应该使人民摆脱致人民于死地的贫穷和饥馑，贫穷造成了革命，贫穷也能断送革命。”他是国民公会中把粮食问题和革命的成败联系起来的第一个人。〔42〕第二，在1793年5月以前山岳党人的议事日程上主要的问题是对外战争、宪法、审判并处死国王、平定旺代叛乱、围绕杜木里厄叛国问题同吉仑特派斗争等等。1793年2月22日在雅各宾俱乐部议论是否安排讨论收购商问题时小罗伯斯庇尔指出“过多地反复讨论粮食储备问题会使共和国不安”，最后会议否决了这个要求，因为“会议应该不受干扰地讨论宪法，任何其他问题都不应该在这个问题未结束之前列入议程”。〔43〕可见在这个时期山岳党人对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办法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在他们的议程上最重要的是宪法而不是粮食。直到1793年4月，罗伯斯庇尔在《论巴黎的骚动》一文中含混地谈到“我们将颁布美好的法令借助于法令将使商品的价格和贫民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接近。我们必须组织公务劳动……，而我们首先要取缔投机活动。”他并未像圣茹斯特那样提出取消指券而是提出要努力恢复指券的信用，惩办违法官吏。〔44〕

山岳党人确实未曾首先提出限价问题，然而他们是否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反对或敌视

群众的限价要求呢？没有。非但如此，无论是在限价要求的理论根据——财产权，自由贸易问题，生存权等方面还是对待无套裤汉的限价要求和粮食骚动的态度上都可以证明：山岳党人，特别是其主要领导人罗伯斯庇尔的思想和行动更完正，更集中，更彻底地反映了整个无套裤汉运动的社会要求。

在财产权问题上，山岳党人和无套裤汉的理解是一致的：他们并不反对，也不想消灭私有财产，他们认为革命的目的恰恰在于使无产者变为有产者。1793年4月24日罗伯斯庇尔关于“权力宣言”在国民公会说道：“当然不需要革命全世界就能知道，财产的极端不平等是许多灾难和很多罪行的根源，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坚决相信财产的平等只是一种空想……”但是他要求确定财产权的界限。他认为“所有权是每个公民享有和支配法律所保障的那一部份财产的权力”，“所有权和其他权利一样，是受到尊重他人权利的义务的制约”，“它不应该损害他的同胞的安全、自由、生存和所有权”，“违反这一原则的所有占有、所有贸易都是非法的和道德的”。〔45〕

罗伯斯庇尔几乎和上面提到的无套裤汉思想家们同时提出了生存权问题。1792年12月2日在关于粮食供应问题的讲话中他十分明确地说道：社会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不可转让的人权。占第一位的权力是什么呢？这就是生存权”，“任何人也没有权力在有人要饿死的时候把粮食堆积如山”。〔46〕下面我们还将看到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山岳党人和吉伦特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山岳党人企图消灭财产的极端不平均实现无套裤汉那种小康社会的理想，圣茹斯特描绘的这一理想社会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是“斯巴达和雅典的繁荣时代的幸福，……是美德、富足、平均财富的幸福……，一张犁、一块土地、一座与国库无涉的茅屋、一个无意于掠夺他人的家庭——这就是我们说的幸福的所在”。〔47〕

山岳党人认为财富并不应该是无套裤汉主要追求的目标，主要追求的应该是权利和幸福的平等，没有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也就不会有自由和社会幸福，他们把社会幸福看得高于个人的幸福。罗伯斯庇尔说过“我不仅把财富看作支付给罪行的报酬，而且看作是对罪行的惩罚，为了不成为不幸的人，我宁愿作一个穷人。”〔48〕“对于那些纯洁的、高尚的人们来说，幸福的存在要更珍贵得多，那些引起腐化的财富，对它的占有者比没有财富的人更有害”。〔49〕圣茹斯特则认为“财富是罪恶”。〔50〕

这就是山岳党人的财产观，这就是山岳党领袖们对财产权的理解。而那些彻夜排队等候在食品店前的衣衫褴褛的无套裤汉们在期待着为他们的子女弄到一点少得可怜的甚至是发霉的面包的时候，他们想到的还有保卫共和国、国民公会和1793年宪法，他们甚至有勇气提出为了克服困难而不吃糖、紧衣缩食，这时候他们不正是这样理解财产权的吗？

自由贸易问题。1792年12月2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关于粮食供应问题的讲演中包括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全部思想。他首先提出了吉伦特派所维护的自由贸易理论的弊病和不完善的地方就在于“这种理论的制造者只是把生活最必需的食品看作普通的商品，对粮食贸易和兰靛贸易显然不加任何区别，他们更多的是从事粮食贸易而不是人民的粮食供应”，指出他们注重的是商人和土地所有者的利润，而把人民的生命视同儿戏”

商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把粮食囤积起来待价而沽。因此“社会法令首先必须保证其所有成员的生活资料，所有其它的法令都要服从这一点……如果认为财产权在任何时候都是与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相抵触是不对的”。他指出“一个人所必需的食品是如此神圣，就像他的生命一样，为了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大部分都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财产”。罗伯斯庇尔驳斥了限制粮食贸易就是“侵犯财产权”的观点，指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正是这些人自己规定禁止粮食出口，并对从印度进口的香料其他珍贵商品规定了较高的价格。而如果法律不能监督投机活动就将怂恿贪得无厌。他重申“我不想剥夺他们任何诚实的利润，任何合法的财产，我只是要剥夺他们侵犯别人财产的权力，我不是消灭贸易，而是消灭垄断者的掠夺”。最后，罗伯斯庇尔指出商品的流通。就像“人体的血液循环”一样是社会所必需的，但是如果在“对商品流通不加限制的借口下实行破坏就是对人民的打击，是饥饿的根源”。他认为阻碍商品流通的主要原因是商人的囤积垄断和投机活动，他建议实行粮食统计，包括统计每个地区和每个农民收获粮食的数量。其次，“必须迫使所有粮商在市场上出售并禁止他们把收购的粮食在夜间运走”。^[51]后来这些建议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国民公会颁布的法令中。

从罗伯斯庇尔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讲话可以看出，他认为为了维护生存权，就必须对生活必需品的贸易实行限制，这种限制无论在价格（主张自由贸易的人自己就规定了粮食和其他商品的价格）、时间和地点方面都是需要的，而罗伯斯庇尔更注意的是取缔投机活动。不论限价还是打击投机垄断都是实现无套裤汉所要求的生存权的一种手段，这并不违背山岳党人的哲学和信仰。

总之，这一切都说明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山岳党人在限价及与此有关的问题上真正代表了无套裤汉的思想和要求，而且山岳党领袖们的思想更具体，更明确，更彻底，也更理论化。正是这种思想指导了他们同吉仑特派的斗争，使他们在雅各宾专政时期真正把群众的社会要求变成了立法并用恐怖措施去实行。

在限价问题上各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在这方面我们将看到一种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十分复杂的情况。

吉仑特党人在1792年底和1793年初已经预感到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曾担任过国民公会主席的拉波·圣·埃金说过：“当政治平等建立以后，穷人们很快就开始感到这种平等将由于财产的不平等而削弱，因为平等意味着独立，因此他们就会不满并激烈反对那些决定着他们的需要的人：他们要求财产的平等，但富人们自动满足这种愿望的情况是极少有的，这样就必须用暴力或法律手段达到这个目的”。^[52]这位议员一语道破了这场斗争的实质，这是无财产群众反对富人，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要求实现财产平等的阶级斗争。

在财产权问题上的斗争。吉仑特党人统治的后期国民公会通过了一些相互矛盾的分别反映吉仑特派和无套裤汉的不同要求的法令，说明了议会内部斗争的激烈。如1793年3月18日国民公会下令对宣传分配土地和任何否认土地、商业、工业所有权的人处死刑，但在第二天（3月19日）又通过对无财产群众实行救济的法令。法令开头就宣布两条原则：“身体健康的每个人通过劳动都有得到衣食的权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有得到无偿

救济的权力”，“关心贫民的生存是国家的责任”。〔53〕我们看到前一项法令明显地代表了吉仑特派所坚持的无限制的所有权的思想，后一项法令则实际上公开承认无套裤汉的生存权的要求。关于财产权问题的尖锐斗争发生在讨论宪法草案的会议上。1793年4月23日国民公会讨论吉仑特党人康多塞提出的草案。该草案认为财产权就的尖锐批评。罗是每个公民无限制地利用其财产和资本收入的权力，受到了罗伯斯庇尔代表的雅各宾派伯斯庇尔在发言中指出认为财产权可以“不从属于道德原则”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你们加进去很多旨在保证实现财产权的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条文，但是你们对于确定它的法律性质，一句话也没有说。可见你们的权利宣言似乎不是为人类制定的，而是为了富人，为了产品收购商人，为了投机活动的组织者，为了暴君而制定的”。〔54〕由于山岳党人的反对致使吉仑特党的宪法草案被否决。

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斗争。1792年11月24日巴黎大部分区代表团到公社总委员会要求实行限价，总委员会接受这一要求并向议会提出要求限价的请愿书。28日公社总委员会全体成员和各区代表到国民公会请愿，要求各级政权有实行限价的权力，这次请愿未得到国民公会支持。三天之后罗伯斯庇尔发表了上述自由贸易问题的讲演，明确批评吉仑特派自由贸易理论的错误。又过了一周（12月8日）罗兰又迫使国民公会通过了粮食面粉完全自由贸易的法令，并宣布用军队镇压要求限价的运动。它表明吉仑特派的自由贸易理论是为资产阶级提供绝对的、无限制的投机活动的自由的理论。吉仑特派的这一理论实际上随着一个月后罗兰的下野而宣告破产，接踵而来的是更大的要求限价的骚动。

罗伯斯庇尔所代表的山岳党人和吉仑特派对待人民群众的限价要求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罗伯斯庇尔始终同情广大下层群众的限价要求，上面提到的多利维尔就西摩诺事件给国民公会的信并未引起国民公会的重视，而罗伯斯庇尔却在自己的《宪法保卫者》上刊登了这封信，并且作了评论，指出资产阶级企图利用革命的困难从中渔利。〔55〕在西摩诺被群众打死，立法议会下令追悼，并认为他是为“捍卫秩序与法律”而献身，只有罗伯斯庇尔与马拉反对这种作法。〔56〕而吉仑特派如何呢？罗兰1792年11月19日在给国民公会的信中告诫议会说“议会在粮食事务中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什么也不管……并最坚决地反对一切侵害自由贸易的人”。〔57〕吉仑特派议员、罗兰夫人的崇拜者和座上客蒲佐甚至威胁说：“如果停止自由贸易就将引起饥饿，”“是的，不要骗人，巴黎人！你们的土地什么也不长，我们的土地养活着你们，如果你们停止粮食流通，你们就要完蛋，那时我们将应有尽有”。〔58〕

总之，我们从吉仑特派对待限价问题和对群众限价要求的态度可以看出，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同吉仑特派围绕限价问题的斗争，实质上是广大下层群众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拉明确指出吉仑特派“所希望的仅仅是一个富人的共和国”，一位雅各宾党人也说过“布里索派希望一个富人的共和国，其它人则希望一个贫民的人民共和国”。〔59〕在这场斗争中法国的广大下层群众按照自己的需要，对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和贸易自由重新作了解释，并提出了生存权作为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由于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加进去它原来没有的意义。因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斗争，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群众之间

的阶级斗争，圣西门1802年得出了这个结论被恩格斯誉为“极为天才的发现”。^{〔60〕}

认为罗伯斯庇尔及山岳党人反对实行限价政策的人几乎都举出他对1793年2月骚动的态度作为最重要的佐证。让我们稍多谈一下这个问题。发生在1793年2月23日—25日的巴黎贫民群众骚动，实际上是在无套裤汉要求国民公会颁布限价法令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自行起来用暴力推行限价，其规模在限价运动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它波及了巴黎三十多个区。二月骚动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各政治派别中都引起了极强烈的反响。吉仑特派谴责骚动，并攻击马拉是罪魁祸首，因为马拉25日在自己的报上号召抢劫店铺。马拉则反唇相讥，认为骚动的罪魁是吉仑特派，就是罗兰，因为他们对物价上涨毫无作为。但同时马拉和罗伯斯庇尔都谴责“抢劫者”，罗伯斯庇尔证实他“亲眼看见”在无套裤汉队伍中有“穿着无套裤汉的光荣服装”的富人和外国人，^{〔61〕}埃贝尔派的态度也不甚明朗，埃贝尔在“杜歇老爹”报第219期写道：“有人希望你们走上错误的道路，希望你们正当应该团结起来的时候分裂，希望你们在必须共同对付敌人的时候彼此厮杀”。^{〔62〕}由于吉仑特派和山岳党人的共同反对，国民公会26日决定实行镇压，动员了八万国民自卫军。巴黎公社也宣布凡是没有坚守岗位的人是嫌疑分子，实行搜捕，还声明把“那些贬低国民公会的人”交法庭审判。^{〔63〕}

罗伯斯庇尔为什么反对要求实行限价的二月骚动？这不是和前面说的他同情下层群众的限价要求相矛盾吗？已故苏联学者扎黑尔曾经指出罗伯斯庇尔派的态度较为复杂，一方面他们大都是知识分子，深受当时自由贸易理论的影响，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级受涨价之害比“忿激派”和埃贝尔派少，所以由于对吉仑特派斗争的需要和战争的需要，再加上他们也“同情”粮食不足造成饥荒，才“推动罗伯斯庇尔派在最高限价要求方面采取较吉仑特派更为宽容的立场”。^{〔64〕}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分析罗伯斯庇尔关于骚动的有关评论和讲话，再联系他的一贯思想，就可以看出他的态度与吉仑特派有原则不同，并且不能根据罗伯斯庇尔对二月骚动的态度而断定他反对限价政策。

罗伯斯庇尔对二月骚动的态度有以下几点：第一、他认为“骚动的前提同样是糖和其他物品的价格上涨”；第二、防止骚乱的方法是制裁真正的骚乱教唆者，必须清洗亡命者和“有能力制造饥饿”的人，更重要的是“减轻社会的贫困状态”，以防止敌人利用饥馑进行煽动，他号召巴黎要表现出迄今所表现出来的忍耐精神，并要告诉人民将要颁布法令解决商品价格问题；^{〔65〕}第三、他在1793年3月13日一次讲话中认为，由于反革命分子利用人民的不满制造骚乱，因此骚乱平息下来也就是挫败了阴谋家的企图；第四、联系他的一贯思想分析，可以看出他认为群众的革命发动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在3月13日的同一次讲话中他自称是反暴君和阴谋家的所有起义的拥护者，“我憎恶那些给暴君和阴谋家们以镇压自由的借口的分散的和不能胜利的办法”，^{〔66〕}但是起义是一种反抗暴君的最神圣的“义务”，所以他称1789年7月14日起义和1792年8月10日起义是“必要的起义”，他还写了一篇长文高度评价了8月10日起义，指出暴君企图用法律来奴役人民，因此人民实际上“没有法律”，只有人民有法律的时候人民才是幸福的。^{〔67〕}

我们看到罗伯斯庇尔对二月骚动的态度同吉仑特派是不同的。因为他不否认由于物

价上涨而造成的饥荒是骚动的原因,也并未反对人民群众在骚动中提出的限价要求本身,也并未否定群众惩办投机商的暴力行动本身,他一直强调的就是不要给阴谋分子以镇压自由的借口。因此不能证明罗伯斯庇尔及山岳党人反对限价政策。

认为罗伯斯庇尔所代表的雅各宾派反对并敌视限价的另一个重要论据就是反对并镇压了“忿激派”。从前面论述的“忿激派”和山岳党人(特别是罗伯斯庇尔)的关于限价问题的思想来分析,在打击投机商、保护下层群众的经济利益,争取生存权,限制财产权、自由贸易,甚至对实行限价政策等等方面并不存在原则的分歧,实际上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专政同“忿激派”的斗争的核心是政治问题。很多学者都指出这一点。^[68]

从罗伯斯庇尔1793年6月28日反对扎克·鲁的讲话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他指出鲁的“意图是可疑的,他损害了国民公会的荣誉,他借口说宪法似乎没有包括反对投机商的法令,他作出结论说宪法是为人民制定的,但并不适合人民的要求”。罗伯斯庇尔愤愤不平地说到:“那些默默地爱着人民的人,那些不倦地为人民的幸福工作的人并没有为此而自我夸耀,但是他们极为吃惊地听说他们的工作是反人民的,并且听到说他们代表了暗藏的贵族”。罗伯斯庇尔对鲁在6月26日又出现在科德利埃俱乐部并重复自己的攻击十分恼火,他把扎克·鲁和奥地利、西班牙、庇特、布里索并列,“我确信那些反对国民公会中山岳党的人是人民的敌人”,因为“公安委员会不是反革命的委员会”^[69]

罗伯斯庇尔和“忿激派”在要求限价的斗争中曾经联合起来同吉仑特派作斗争,但是在1793年6月2日雅各宾专政建立以后,在这个政权已开始实现下层群众的限价要求的情况下,“忿激派”的领袖们又以“极左派”的面孔出现把矛头指向代表广大下层群众利益的雅各宾专政,指向国民公会和公安委员会,这正是“忿激派”垮台的实质性原因。因此他们之间的斗争并非是资产阶级和无套裤汉之间的阶级斗争,也不是要求实行限价和反限价的斗争,而是代表广大下层群众利益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事实上埃贝尔派占统治地位的巴黎公社,埃贝尔和肖梅特都参与了反对扎克·鲁的活动,但是却没有有人说他们之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我们在这里并非要评价雅各宾专政镇压“忿激派”的行动本身的功与过,只是企图以此说明:镇压“忿激派”的行为本身并不能证明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专政敌视和反对实行限价政策。

罗伯斯庇尔派和埃贝尔派之间的斗争也具有相同的特点。埃贝尔派作为下层贫民群众的代表在限价和与限价有关的问题上和罗伯斯庇尔派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如在财产权问题上,埃贝尔也反对财产的完全平等,1792年12月埃贝尔在自己的报纸第198期上写道:“我并不要求那些聪明的人们所谓的土地法令……不可能实现财产的完全平等”,而只是要求“那些有钱人大方一些,他们靠贫民的膏血养肥了自己,要迫使那些财主们归还他们从国家抢去的一切,……以补偿战争的耗费”。^[70]在埃贝尔从1792年10月在半官方刊物《反联邦党》上发表的数篇文章集中反映了埃贝尔派关于粮食问题的观点,他提出“人们所必需的一切物品都是社会财产”,他也和雅各宾派一样只反对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自由贸易。埃贝尔派更多的要求实行强迫借款,让富人担负战争费用。埃贝尔也提出生存权的问题,1793年9月他写道:“我永远衷心地尊重财产权,但是难道生命本

身不也是一种主要的财产吗？……土地，像空气和水一样，属于全人类”。〔71〕事实上埃贝尔派的社会要求远远不及罗伯斯庇尔代表的雅各宾派那样明确、彻底和富于理论色彩。以致马迪厄称埃贝尔派“只有一些混乱思想”“他们无所谓社会政策”。〔72〕

埃贝尔和埃贝尔派热烈支持雅各宾政权颁布的所有重要法令：反对投机囤积的法令，一系列的限价法令，1793年宪法和风月法令。埃贝尔在他的报纸第350期称“风月法令”“极好”，“它斩断了所有人民公敌的魔爪，使所有阴谋分子束手无策”。〔73〕

埃贝尔派和罗伯斯庇尔派的分歧主要在于恐怖政策的激烈程度，埃贝尔派是恐怖行动的狂热鼓吹者：他们要求成立革命军带着断头机对付一切投机商和收购商；布里索被处死后埃贝尔在报上高呼“啊！你终于坐上了死刑席，下贱的布里索！”处死王后，这是他“所有欢乐中最大的欢乐”；处死奥尔良公爵（1793年11月6日）后他主张“趁热打铁”，全速开动断头机，他主张用断头机逼迫富人把自己的皮箱掏空，“带着断头机前进，共和国就将胜利”。〔74〕埃贝尔攻击一切商人，他认为商人都是反革命，商人没有祖国，只要他们人头落地，“银子金子和面粉就会重又富足”〔75〕总之，埃贝尔派要用断头机去解决一切，主张实行更激烈的恐怖措施，这是同充满哲理味道、更为深沉、稳健的罗伯斯庇尔式的雅各宾党人所不同的。

由于埃贝尔派当时势力非常之大，他们几乎完全控制了巴黎公社。巴黎各区，如马拉区、博物馆区等也在他们控制之下，科德利埃俱乐部是他们的据点。1793年9月5日骚动中（马迪厄称之为“艾贝尔派的压迫”）已经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埃贝尔的《杜歇老爹》报在1793年8—9月日发行量达到3,000到12,000份，在军队、群众中广为发行。9月6日后倾向于埃贝尔派的俾约·发楞和科洛·得霸加入公安委员会，这一切都使得他们不满意于雅各宾专政的稳健政策，从1793年底他们指责罗伯斯庇尔过于温和，是“催眠派”，对国民公会召回执行埃贝尔派要求的特派员不满。1794年春他们甚至要求实行1792年的“九月屠杀”，并号召再来一次5月31日“起义”。这导致埃贝尔派和罗伯斯庇尔派之间矛盾的激化。1793年3月21—24日埃贝尔和埃贝尔派被送上断头台。公诉人宣布他们的罪名是“把原则作出极端的解释，恣意夸大我们的灾难，对我们的成就牢骚满腹，提出反革命的措施，用饥饿进行威胁，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各委员会身上，竭尽全力进行中伤，诬蔑国民公会，如果不是旨在把自由运动拉向后退，又想干什么呢？”，“我们最终看到他们怎样在各方面罪恶地、激烈地诋毁公安委员会、治安委员会的委员们，总之，他们企图改变国家的代表制度。”〔76〕

总之，罗伯斯庇尔派和“忿激派”与埃贝尔派之间的斗争是经济要求基本一致的前提下由于政治斗争策略的分歧或激进程度的差别引起的，并不足以证明他们反对实行限价政策。

三、限价法令及其实施

限价法令的实施分为三个主要时期。1793年5月31日以前是吉伦特派国民公会在下

层群众的压迫下被迫实行限价的时期，从1793年6月2日至1794年7月27日是雅各宾专政实行限价的时期，从1794年7月27日到12月23日是热月党人逐步废除限价令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吉仑特派国民公会被迫实行限价的时期。到1792年底和1793年初限价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要求，但是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仑特党人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政策，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无限制的贸易自由，他们无视广大下层群众的生存权要求。1793年1月22日罗兰的下野和二月骚动都证明了吉仑特派经济政策的失败。巴黎无套裤汉的势力是如此强大，以致使吉仑特派感到在巴黎站不住脚。他们企图借各郡向巴黎施加压力（“巴黎仅仅是全国的八十三分之一！”），但他们寄以无限希望的各郡结盟军来到巴黎之后很快就被巴黎的无套裤汉争取过去，吉仑特派中甚至有人提出将他们控制的议会迁出巴黎。最后不得不向下层群众屈服：1793年4月18日国民公会副议长表示接受群众提出的规定物价和工资的合理比例的要求，表示承认饥馑的原因是投机活动、指券贬值，解决的办法是实行限价。国民公会经过反复讨论确认了两条原则：一是“生存权，这是天赋的第一位的所有权，社会应该给予公民保证其生存的手段”；二是“财产所有者无权把自己的财产用来做对社会有害的事”。〔77〕这次会议是吉仑特派在群众压力下实行限价政策的第一步。又经过多次激烈的争论国民公会被迫于1793年5月4日颁布了法国革命史上第一个限价法令，历史上称作第一次限价。

这项法令共有31条。主要内容如下：“本法令公布后要求每个商人、农民、粮食和面粉所有者立即向所在市政机关申报其拥有的粮食和面粉数量和种类，并应大致说明其行将打谷的粮食种类，各区负责人应指派委员负责所属各市政机关分别实施此项法令”

（第一条）；然后由市政官员逐户核实，不实者予以没收（第四条）；规定粮食面粉只准在公共市场或习惯上认可的地方出售，违者处以罚金，由买卖双方均摊（第六条）；商人和粮食所有者凭市政当局执照只准购买他们自身消费一个月的粮食（第7条）；拒绝征发的除证明其所有谷物不超过来年新粮下来前自己所需的数目外，否则没收（第12条）；此外第21条规定“禁止所有国家官员与国家市场有联系，不管是直接和间接的，违者处以死刑”；第25条规定各区须向各郡上报本区自1792年1月1日到1793年5月1日的市场价格以实行“粮食最高限价”，从价格表中得出平均价格即为该项商品的最高限价价格。然后上报内政部。第27条规定违反最高限价规定买卖粮食者要受到没收所卖粮食的处分。第28条规定“所有心怀敌意和蓄意破坏，丢弃或私藏粮食及面粉者被认为有罪并处以死刑”。法令还规定奖励揭发违法者。〔78〕

这项法令是在下层群众的压力下通过的，但是由于敌视限价的吉仑特派的统治，这项法令实际上并未执行。所以到雅各宾专政时期（即1793年8月25日）曾经重新颁布关于实行5月4日限价法令的命令。

第一次限价法令的发布标志着吉仑特派经济政策的失败，这是无套裤汉争取生存权，要求实行限价的斗争的第一次胜利。这项法令未能执行，后果却是明显的：“在业经实施之处，每使市场空虚，因为出卖谷物区域不愿贱价将其出卖。巴黎的粮食来源减少，故巴黎更感粮荒”。〔79〕

第二个时期即雅各宾专政实行限价的时期。这个时期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党